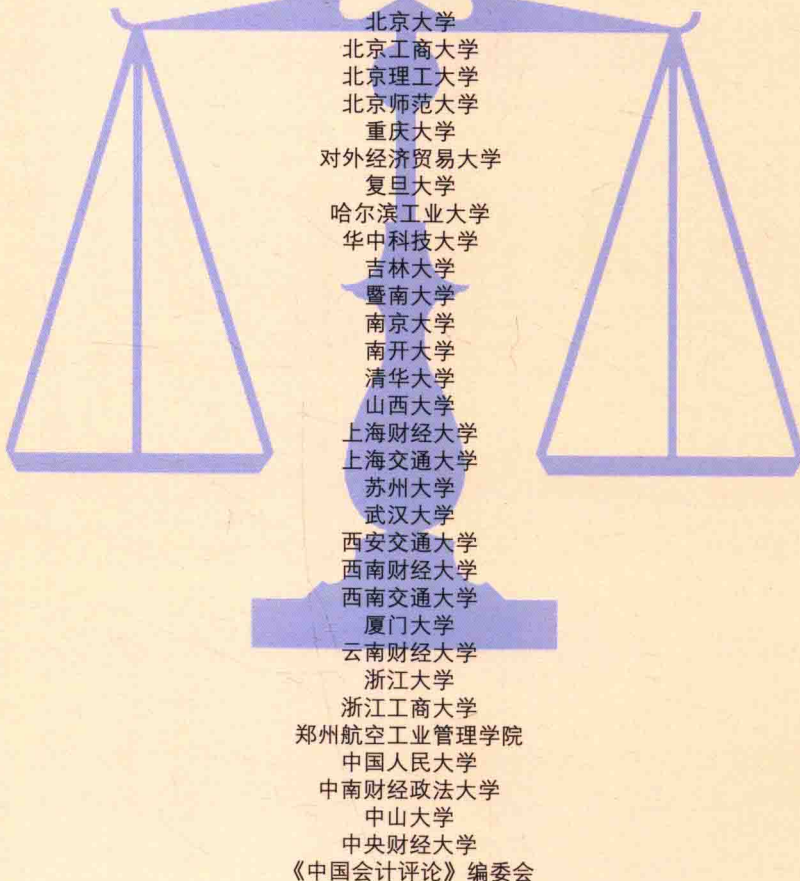


第13卷 第1期  
(总第39期)  
Vol. 13 No. 1

# 中国会计评论

CHINA ACCOUNTING REVIEW

《中国会计评论》理事会  
(按大学、机构名称拼音字母排序)



北京大学  
北京工商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重庆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复旦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吉林大学  
暨南大学  
南京大学  
南开大学  
清华大学  
山西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苏州大学  
武汉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厦门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  
浙江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山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会计评论》编委会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 3

# 中国会计评论

## CHINA ACCOUNTING REVIEW

### 名誉顾问

厉以宁/北京大学

梁允能/清华大学

### 主 编

王立彦/北京大学

### 副主编

陈 晓/清华大学      吕长江/复旦大学

刘 星/重庆大学      刘志远/南开大学

### 编 委(按编委姓名拼音排序)

|            |          |
|------------|----------|
| 陈 晓/清华大学   | 刘志远/南开大学 |
| 陈信元/上海财经大学 | 吕长江/复旦大学 |
| 刘 峰/中山大学   | 曲晓辉/厦门大学 |
| 刘 星/重庆大学   | 王立彦/北京大学 |

### 编辑部

|             |          |
|-------------|----------|
| 岳 衡/北京大学    | 肖 星/清华大学 |
| 李 娟/北京大学出版社 | 伍利娜/北京大学 |

### 编辑部 IT 事务

曾建光

### 编务助理

湛嘉席

### 地 址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一号楼 529 室

(邮编:100871      电话:010-62767992)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9 室

(邮编:100871      电话:010-62750037      传真:010-62556201)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会计评论. 第 13 卷. 第 1 期/王立彦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7-301-26343-3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会计—中国—丛刊 IV. ①F2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9320 号

书 名 中国会计评论(第 13 卷第 1 期)

Zhongguo Kuaiji Pinglun

著作责任者 王立彦 主编

责任编辑 李 娟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343-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em@pup.cn](mailto:em@pup.cn) QQ:552063295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经管图书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9 印张 150 千字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International Price: \$38.00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 《中国会计评论》理事会

(按大学、机构名称拼音排序)

## 理 事

|             |     |
|-------------|-----|
| 北京大学        | 吴联生 |
| 北京工商大学      | 杨有红 |
| 北京理工大学      | 陈宋生 |
| 北京师范大学      | 崔学刚 |
| 重庆大学        | 刘 星 |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 汤谷良 |
| 复旦大学        | 洪剑峭 |
| 哈尔滨工业大学     | 王福胜 |
| 华中科技大学      | 张兆国 |
| 吉林大学        | 赵 岩 |
| 暨南大学        | 熊 剑 |
| 南京大学        | 王跃堂 |
| 南开大学        | 张继勋 |
| 清华大学        | 肖 星 |
| 山西大学        | 张信东 |
| 上海财经大学      | 孙 铮 |
| 上海交通大学      | 徐晓东 |
| 苏州大学        | 罗正英 |
| 武汉大学        | 王永海 |
| 西安交通大学      | 田高良 |
| 西南财经大学      | 蔡 春 |
| 西南交通大学      | 肖作平 |
| 厦门大学        | 陈汉文 |
| 云南财经大学      | 陈 红 |
| 浙江大学        | 姚 铮 |
| 浙江工商大学      | 许永斌 |
|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 张功富 |
| 中国人民大学      | 支晓强 |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 王雄元 |
| 中山大学        | 魏明海 |
| 中央财经大学      | 孟 焰 |
| 《中国会计评论》编委会 | 王立彦 |

## 特邀理事

|                |     |
|----------------|-----|
| IASB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 张为国 |
| 中国会计学会         | 刘玉廷 |
|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 陈毓圭 |

# CHINA ACCOUNTING REVIEW

Vol. 13 No. 1

March, 2015

## CONTENTS

### Articles

- Board Network and Accounting Policies' Convergence: Evidence Based on  
Implicit Decision of Development Cost in China  
..... Yongtao Liu, Yunsen Chen, Deren Xie and Dengjin Zheng (1)
- Investors' Industry Halo Effect and Listed Companies' Timing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 Riguang Wen (31)
- Would Auditors Treat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Book-tax Differences  
Discriminately? The Evidence from Loss Listed Companies  
..... Renji Zhang and Yu Yuan (53)
-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Human Resource Input and Operating Performance  
for Public Accounting Firms  
..... Yushu Zheng and Yipei Liu (71)
- The Dilemma of Acquaintances Trading Patterns and Breakthrough of Credit  
Mechanism in the Professional Services Firm: Research Based on the  
Data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Annual Report from 2009 to 2013  
..... Jiangtao Li and Wenlong Yan (93)
- Disequilibrium of Supply and Demand on the Skill Structure of Chinese  
Accountant Talents: Present Situation and Strategy  
..... Ling Li and Yan Meng (117)

## 董事连锁网络与会计政策趋同 ——基于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隐性选择的证据

刘永涛 陈运森 谢德仁 郑登津\*

**摘 要** 连锁董事作为董事兼任网络中重要的“节点”,是不同公司信息传递的媒介,会对公司会计政策选择造成影响,进而引起会计政策的趋同行为。中国新会计准则下的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具有专业性,不属于公共信息,成为检验董事连锁网络信息传递的绝佳机会。本文同时结合董事连锁本身和个体董事居于董事网络的中心位置程度两个视角,通过考察上市公司在不同年份进行开发支出的隐性会计政策选择,研究连锁董事如何通过董事网络的信息传递机制影响公司的会计政策选择。结果发现,在当年执行过开发支出资本化的上市公司中,如果其聘任的独立董事在其他上市公司兼任内部董事或独立董事,那么目标公司将会有更大的概率也选择同样的会计政策;独立董事在其他选择开发支出资本化会计政策的公司兼任董事的频次越大,连锁董事对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的传递效应越明显;独立董事在董事网络中的网络中心度越大,公司也越可能执行开发支出资本化会计政策。结论显示,由于信息传递渠道和学习效应的存在,不同公司的会计政策会因连锁董事的网络联结而逐渐趋同。

**关键词** 董事网络 连锁董事 独立董事 会计政策 开发支出资本化

### 一、引 言

随着对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方面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发现,由于董事的具体决策行为和决策过程不可见,以往那种通过观察外在的董事群体特征(比

\* 刘永涛,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陈运森,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谢德仁、郑登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通信作者:陈运森,E-mail:chenyunsen@vip.sina.com。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开发支出会计政策的隐性选择: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71172010)、“董事网络与公司信息传递:需求、渠道与后果”(71202126)和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董事网络与公司政策趋同行为研究”(20120016120003)的成果,陈运森还感谢国家留学基金、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项目、北京市会计类专业群(改革试点)建设项目和中央财经大学校级 2011 协同创新重点培育项目“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的资助。

如独立董事的比例,其独立性、专业性等)进行研究的方法,很容易忽略掉独立董事作为独立个体的差异性。近年来,国外研究对把董事的特征指标过于同质化和绝对化而忽略董事个体差异的指责日益增加(Chen et al., 2010; Masulis and Mobbs, 2011)。为了突破这种困境,逐渐有学者从社会网络和信息传递的视角来进行研究,如 Adams and Ferreira(2007)和 Duchin et al. (2010)等试图从信息获取能力差别视角来区分董事的决策效果。已有研究发现,董事的信息可以通过其与高管的社会联系(Cao et al., 2014)以及外部兼任董事(Masulis and Mobbs, 2011)等渠道来传播,从而突出了董事的各种网络关系对董事个体信息获取进而对公司决策的影响。与企业管理、战略、市场营销和经济社会学等学科逐渐引入社会网络理论及其分析方法不同,公司财务领域对社会网络,尤其是董事网络的关注则刚刚起步(Larcker et al., 2013; Brown and Drake, 2014)。国内从会计政策视角深入探讨董事网络与政策选择的文献尚少,本文则试图从董事连锁网络的视角来分析独立董事对公司会计政策选择进而导致政策趋同行为的影响。

2007年实行新会计准则后的一个突出变化就是开发支出的资本化会计处理,这是在充分借鉴国际会计准则基础上调整的,由于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的专业性不属于公共信息,所以用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来检验董事连锁网络与会计政策选择是非常合适且又符合中国制度背景的。<sup>1</sup>新准则在无形资产准则部分将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区分为研究阶段支出与开发阶段支出,并开始允许企业将满足五个条件的开发支出予以资本化<sup>2</sup>,而此前的会计准则要求将全部开发支出都予以费用化。表面上看,无形资产准则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开发支出资本化的五个条件并非一目了然到可以简单地做出正确选择,而是非常依赖企业管理层的私有信息和职业判断。相对于企业在固定资产折旧会计政策可以在直线法和加速折旧法之间自由选择的会计政策显性选择,开发支出会计政策的选择具有隐性选择(implicit choice)的特征(谢德仁和刘永涛, 2013)。我们的研究就是想探讨连锁董事对会计政策的这种类似的隐性选择会有怎样的影响。

<sup>1</sup> 检验社会网络对公司政策传递效应的前提必须是所检验的公司政策所需核心信息并不是公开披露的,独立地产生于每个公司的概率较低(Bizjak et al., 2009)。

<sup>2</sup> 无形资产准则规定,开发支出在同时满足下述五个条件时才可资本化:(1) 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够使用或出售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2) 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3) 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包括能够证明运用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品存在市场或无形资产自身存在市场,无形资产将在内部使用的,应当证明其有用性;(4) 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发,并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5) 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

具体地,结合开发支出的资本化会计处理是2007年实行新会计准则后的一个突出变化,本文则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7—2012年的企业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隐性选择数据,同时结合董事连锁本身和个体董事居于董事网络的中心位置程度两个视角,来考察独立董事之间的连锁网络关系是否会产生会计政策选择的传递学习效应。实证结果发现,如果当年执行过开发支出资本化的上市公司聘任的独立董事在其他上市公司兼任内部董事或独立董事,那么目标公司将会有更大的概率也选择同样的会计政策;独立董事在其他选择开发支出资本化会计政策的公司兼任董事的频次越大,连锁董事对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的传递效应越明显;独立董事在董事网络中的网络中心度越大,公司越可能执行开发支出资本化会计政策。进一步研究发现,如果独立董事是审计委员会主任或具有会计背景,那么这些连锁董事对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的传递效应更明显。

本文可能的创新如下:首先,连锁董事及其所组成的董事网络与各类公司财务行为的影响成为近几年国际和国内会计、财务领域的热点之一,但现有研究大都基于董事连锁网络与高管薪酬(Bizjak et al., 2009; Andres and Lehmann, 2010; 陈运森和谢德仁, 2012)、投资活动(陈运森和谢德仁, 2011)、信息披露(陈运森, 2012)、避税活动(Brown and Drake, 2014)、公司业绩(Larcker et al., 2013)等公司治理及其后果,较少有研究从信息传递视角探讨连锁董事对公司政策特别是会计政策趋同行为的影响。而对于董事连锁网络的现有研究,要不就以直接的连锁董事本身作为网络传递渠道,要不就计算董事的整体网络中心程度,这两种方法都未同时考虑网络的直观性和整体性。本文的结论在视角和方法两方面拓展了董事连锁网络与公司财务的交叉文献。其次,Chiu et al. (2013)发现财务重述政策会通过连锁董事进行传播,但与美国会计准则相异,2007年中国新会计准则对开发支出会计政策的规定使得其能成为很好的检验连锁董事和公司政策趋同行为的“试验田”,选择并非多数董事都熟知的非公共信息——开发支出资本化隐性会计政策选择——作为研究场景,能更精确地检验会计政策是通过董事连锁网络传播的而非其他。所以,本文的结论为相关文献提供了中国特色的文献,同时也拓展了现有信息传递效应的研究。再次,由于我国是在2007年之后才存在开发支出资本化的问题,所以相关的研究文献还不够丰富,结论也为开发支出资本化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一些证据,有效拓展了开发支出资本化文献。最后,本文的结论对具体实践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某个公司如果想引入某项属于非公共信息的会计政策,则聘任已执行该政策行为的公司的独立董事就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同时由于正面和负面的会计政

策都可能会通过连锁董事的信息媒介进行传递,这给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制定也提供了部分启示。

本文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的提出,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实证分析在本文的第四部分,第五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我们首先从两个方面回顾相关的研究文献,董事网络的相关研究近年方兴未艾,而开发支出会计政策的相关文献相对较少,原因是:一方面,美国会计准则规定研发支出(除软件开发支出外)必须予以费用化,所以不存在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隐性选择的问题;另一方面,我国是在2007年实行新会计准则之后才存在开发支出资本化的问题,所以相关的研究文献还不够丰富。其次,我们分析连锁董事对开发支出会计政策的影响的逻辑,进而提出本文的假设。

### (一) 董事网络理论及其信息传递效应

从网络关系视角研究连锁董事行为起源于社会网络理论及其分析方法在公司治理领域的应用,较早的研究形成了资源依赖理论、共谋理论和金融控制理论(Eisenbeis and McCall, 1978)等。近几年,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董事网络关系研究开始兴起。比如, Battiston et al. (2003)构建模型研究了决策如何在公司间通过连锁董事形成的网络进行传播,他们发现董事网络传递的信息会影响董事之间的决策行为。Bizjak et al. (2009)研究了董事会联系在解释具有争议性的股票期权倒签实践中的扩散作用,发现如果董事成员以前在其他公司从事过类似的倒签行为,公司倒签股票期权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Kang and Tan (2008)认为股票期权授予的自愿性费用化可能由董事连锁导致的社会影响所驱动:如果公司的内部董事与其他进行过股票期权授予的自愿性费用化决策的公司连锁,或者与曾经投资过财务舞弊公司的机构投资公司的董事会连锁,那么公司更可能自愿费用化股票期权。Chiu et al. (2013)检验了盈余管理是否通过董事网络在公司间传递,发现如果一个公司与另一个公司通过连锁董事相联,而相联公司在当年或前两年内发生过财务重述事件,那么这个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也更大。Cai et al. (2014)则检验并发现了季度盈余公告终止事件会通过连锁董事在不同公司之间进行传播。Stuart and Yim (2010)以公司董事曾经在进行过私募股权融资的公司中担任董事或者管理层作为是否具有私

募股权融资背景连锁董事的代理指标,发现有私募股权融资背景的连锁董事所在的公司更容易成为私募股权投资的目标。Brown and Drake(2014)则发现与低税收公司的董事网络越发达,目标公司越可能拥有更低的有效税率。国外现有文献主要研究董事网络对于公司治理能力、政策改变以及公司业绩的影响等,有关信息传递视角的研究尚缺乏足够的经验证据,特别是关于董事网络通过信息传递对公司会计和财务政策的影响,目前的文献还很少涉及。

国内关于连锁董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管理领域。比如,毛成林和任兵(2005)论述了企业的董事连锁网络发挥作用主要是通过社会监督、网络寻租和注重集体忽视个体三个机制。卢昌崇和陈仕华(2009)认为连锁董事可以通过企业间的正式协调、非正式协调以及信息传递发挥组织功能。除此之外,国内公司财务和会计领域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董事网络关系的研究也日渐增多。比如,谢德仁和陈运森(2012)从“结点”和“关系”两个维度界定了董事网络的边界,并阐述了独立董事在董事网络中的核心地位。陈仕华和马超(2011)以266家在汶川地震之后进行过捐款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公司之间的高管联结对公司慈善行为的影响,发现存在高管联结的公司 in 捐款行为方面表现出一致性。陈运森和谢德仁(2011,2012)则研究了独立董事的网络中心度差异对公司投资、高管薪酬的治理作用,发现董事网络中心度越高的独立董事,越能够提升公司投资效率,增加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但鲜有研究深入探讨连锁董事对公司会计政策的影响。关于近年来董事网络的详细文献参见陈运森等(2012)。

## (二) 开发支出会计政策的相关文献

国外对开发支出会计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行国际会计准则的国家。对于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从会计学研究来看,会自然先将其与盈余管理联系起来。比如,Mande et al. (2000)通过对日本企业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存在通过调节研发支出平滑利润的行为,且开发支出资本化的会计政策与企业研发投入密度正相关。Prencipe et al. (2008)以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研究了家庭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他们发现,研发投入少、研发投入波动大以及为避免亏损的家族企业更倾向于采用开发支出资本化政策。另外,还有一些文献研究企业是否通过调节研发支出本身(并非通过其会计政策选择)来进行盈余管理。例如,Dechow and Sloan(1991)发现管理层临近退休时,会减少企业的研发支出;Bushee(1998)发现,如果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高,公司管理层不会用削减短期研发支出这种方式来进行盈余管理。对资本市场动机的研

研究与开发支出资本化的价值相关性乃至开发支出本身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等研究常常是混合在一起的,不完全是所谓的盈余管理行为。对此方面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开发支出资本化与资本市场反应的关系,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数据来看,资本市场对研发支出资本化有着正面的市场反应,至少短期如此(Aboody and Lev,1998;Callimaci and Landry,2004)。对于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因素,多是从一些企业整体业绩指标和特征指标来考察,涉及公司治理特征的经验研究还比较少见。比如,Aboody and Lev(1998)通过对163家软件企业10年来的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软件企业对研发支出的资本化与股票收益正相关,且研发投入密度越高,越可能采取开发支出资本化的会计政策。Cazavan-Jeny and Jeanjean(2006)对197家法国上市公司1993—2002年的研发支出进行研究后发现,研发支出资本化与股票价格和回报负相关,总资产报酬率越低、盈利波动越大的企业越可能采用开发支出资本化会计政策。还有一些研究表明,企业的规模越小、财务杠杆越高,越倾向于将开发支出资本化(Daley and Vigeland,1983;Bushee,1998;Prencipe et al.,2008;Cazavan-Jeny et al.,2010)。

国内研究开发支出会计政策的文献非常少,这是因为,我国从2007年才开始实施新会计准则,研究数据累积不足。仅存的文献也是依据小样本做出的研究,主要还是从盈余管理的角度出发。比如,宗文龙等(2009)利用我国2007—2008年沪深两市开发支出资本化企业的样本,对企业开发支出资本化动因进行了研究,发现企业财务杠杆越高,企业的资本化强度越高,企业还存在利用资本化政策实现扭亏的行为。许罡和朱卫东(2010)以我国2007—2008年披露研发费用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越大,其研发支出采取资本化政策的概率越高;管理当局通过对研发支出进行盈余管理,以避免亏损和满足再融资的需要。谢德仁等(2014)发现管理层具有薪酬辩护等动机,并利用开发支出资本化进行盈余管理;黄亮华和谢德仁(2014)发现拟IPO公司的现金流约束和业绩压力也会影响其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姜博等(2014)发现在高管股权变动的总体样本中,高管股票净减持的公司在持股变动的前一季度更倾向于选择将开发支出资本化。

### (三) 董事及其连锁现象对开发支出会计政策的影响

首先,本文根据资源依赖理论分析连锁董事促进信息(政策、资源)传递(发挥董事会战略咨询的职能)的逻辑。董事会治理机制的产生源于最小化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所带来的代理成本问题(Fama,1980;Fama and Jensen,1983;

Shleifer and Vishny,1986)。分散的股权致使股东无法去监管经理人的活动,而且也产生了“搭便车”的问题(没有一个股东有足够大的动机去监督经理人,使其和股东的利益一致)(Grossman and Hart,1980)。而董事会代表公司股东对公司的内部进行监督控制以最小化代理成本、保护股东权益。学者们也着重研究了董事会的这一监督职能(Fama and Jensen,1983),比如董事会在雇用和辞退经理层以及制定管理层薪酬时具有决定权,可以较好地监督管理层,以降低代理问题。但是,学者们也提出了关于董事会的另一个职能——建议咨询职能——的观点。Davis et al.(1997)认为经理人具有渴望成功的心理,希望获得别人的认可,实现内心的满足感,因此经理层也会以实现股东利益为己任,和公司董事会其他成员通力合作,而且他们作为内部董事对公司的了解程度较高,实战经验丰富及相关的专业知识也有益于董事会发挥战略咨询的职能(Brickley and Zimmerman,2010)。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一个组织的生存依赖于与其所必需的资源紧密相关的外部环境,组织将对重要资源的依赖程度降到最低,并试着去影响环境以便易于取得所需的资源。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企业嵌入资源的依赖关系之中,存在着资源约束,而且其外部环境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此时董事会被看作是重要的“边界管理者”(boundary spanners),董事们通过自己的分析积极参与企业的战略制定,使经理层能够及时地获得相关信息,帮助企业获取制定和实施战略所需的关键资源,董事会的战略咨询职能有利于提升公司业绩(Pfeffer,1972)。而连锁董事则较好地体现了董事会的建议咨询职能,将不同的公司(群体)联结起来,在不同的公司中发挥重要的“节点”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公司之间“协同”机制的作用,并且为公司间带来专业的信息、实战经验和专业技能等重要资源;进一步来说,一般连锁董事在业界和专业领域的知名度相对较高,有着优质的声誉,能为企业提供更加优质的信息和资源。总之,连锁董事有利于公司间有关战略(政策)信息的传递,降低战略(政策)制定的交易成本和环境的不确定性(Zahra and Pearce,1989)。

其次,开发支出资本化究竟反映了什么(或者说带来怎样的经济后果)?我们认为,开发支出资本化是一个关于公司价值判断的信号。一方面,开发支出资本化向资本市场传递积极的信号,提高了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我国的数据来看,资本市场对开发支出资本化都有着正面的市场反应,至少短期如此(Aboody and Lev,1998;Callimaci and Landry,2004;程小可、孙健和姚立杰,2010)。周兰和宋雁群(2011)从开发支出资本化的市场反应角度验证开发支出资本化信息的有用性,发现市场充分吸收了开发支出资本

化信息,开发支出资本化提高了股价与当期会计盈余的正相关程度,提高了信息的有用性,对于研发强度与资本化比例比较高的行业,证券市场能很好地吸收开发支出资本化对当期会计盈余信息的影响;王亮亮、王跃堂和杨志进(2012)发现,开发支出资本化与企业价值正相关,开发支出资本化提高了企业财务报表的价值相关性。另一方面,开发支出资本化也是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降低了会计盈余信息的可靠性(Prencipe et al., 2008)。Dinh Thi et al. (2009)运用 2001—2006 年德国企业的数据研究发现,只有在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股票的市场价格才对开发支出资本化做出反应。Cazavan-Jeny et al. (2010)基于法国的数据研究发现,开发支出资本化一般与未来业绩负相关或呈现中性影响,对同时费用化和资本化研发支出的企业,费用化的研发支出与未来业绩有着更强的负相关关系,故他们认为,也许因为高管利用开发支出资本化进行盈余管理或无法估计研发项目的盈利能力,所以高管无法利用开发支出资本化来传递关于未来业绩的真实信息。叶建芳与刘大禄(2008)以大族激光公司为例分析了开发支出规定的优点以及存在的缺陷,认为资本化的太多条件依赖于企业管理的主观判断,增大了企业盈余管理的空间。正因为开发支出资本化是企业价值信号的体现,而且可能同时产生正反两个方向的经济后果,所以企业对开发支出是否资本化的会计处理也应该比较谨慎。此时,连锁董事曾经任职的公司是否存在开发支出资本化将会对其现在所在任的企业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产生重要影响,因为这些连锁董事具有开发支出资本化的实战经验或财会专业的背景,更了解开发支出资本化在不同环境下的经济后果,从而降低了开发支出会计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因此,连锁董事有利于促进开发支出会计政策的趋同。

再次,独立董事是否有能力和机会去影响企业开发支出资本化的政策?从能力的角度来说,一方面,企业在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上到底是资本化还是费用化,自然是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相互博弈的结果,最直接、最有影响力的非董事会和企业管理层莫属。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虽然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权(在会计准则许可范围内)名义上由董事会享有,但方案是由企业管理层先提出来的,之后才由董事会进行决策,且企业管理层成员可能作为内部董事占董事会的多数席位,为此,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权实质上控制在企业管理层手中。但董事会中的独立董事通过董事会及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有着重要影响。实践中,独立董事参与企业治理和会计政策适当性评估的时间精力是很有限的,其必须依赖以独立董事为召集人构成的董事会下设的审

计委员会及公司内部审计部门来提供信息等支持。审计委员会和内部审计部门还负责监督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性和有效性,而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对于研究支出和开发支出本身的正确划分、归集及会计处理也是至关重要的。此外,以独立董事为召集人所构成的董事会下设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通过对经理人薪酬合约的设计和其中业绩指标的设计也可影响企业管理层对开发支出会计政策的隐性选择。另一方面,在会计政策选择的具体决策中,董事会和管理层除了考虑企业的利益和自身的利益(比如,为了企业或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采取盈余管理行为,根据实际需要开发支出进行资本化或费用化)外,还要照顾其他利益相关者(比如控股股东、机构投资者、审计师、债权人、监管部门等)的诉求。尤其在新会计准则实行后的首次开发支出资本化决策中,同行业、竞争对手或同地域同性质<sup>3</sup>的其他上市公司都是董事会和管理层进行会计政策选择决策的参考对象。董事会和管理层客观上有参考其他公司选择结果的信息需求,而企业的内部董事和管理层同在一个公司,其信息集是共有的,唯一的外部信息输入就是独立董事和其所在的董事网络。独立董事由于可能在不同的公司兼任,拥有其他公司相关会计政策选择的信息。

从机会的角度来看,开发支出资本化这种隐性会计选择既可以传递公司未来前景的私有信息,也可以被管理层用来进行盈余管理,企业和管理层应该比较看重开发支出会计政策的选择,但是由于开发支出隐性选择政策的专业性,更可能基于独立董事网络而非大众投资者网络进行传播。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隐性选择会披露出企业管理层的私有信息,如开发支出资本化反映开发支出是成功的这一“好消息”,而开发支出费用化则反映开发支出很可能失败的“坏消息”;而且由于新准则规定对于上期及此前资本化的开发支出在当期相关新产品或新技术开发失败后全部计入当期损益,无须进行追溯调整,这就可以被企业管理层用来操纵乃至扭曲私有信息的披露。开发支出会计政策的选择给了企业和管理层很大的主观性空间,管理层需要独立董事网络传递这种重要的专业会计政策选择的信息和经济后果。具体来说,如果某公司在 $t$ 年实行了资本化政策(不管是该公司董事提出的建议还是仅是参与决策),则该公司的董事获取了这一会计政策选择的信息,而且将更可能已经知晓其资本化的政策执行背景、执行要素、注意事项以及诸多经济后果(私有信息披露、盈余管理)信息,那么董事更有可能把这一信息传递到同时或者后续任职的公司中,从而更可能向

<sup>3</sup> 此处的同性质指同属国有企业或私营企业,也可能是同属国家或地方国资委管辖等。

其管理层建议使用开发支出资本化的会计选择方法。相关的一些研究表明,独立董事的信息和关于企业决策的知识除了自身的积累外,还通过董事网络进行传播。如果一家公司以前采用了某一商业实践,那么与其有董事联结的公司随后也会采用同一实践,像“毒丸”计划和“金降落伞”计划(Davis and Greve, 1997)、政治选择贡献(Mizruchi, 1996)、并购类型(Haunschild, 1993)、事业部组织形式(Palmer et al., 1993)和并购支付溢价(Haunschild, 1993)等,都是通过连锁董事关系进行传播的。所以可以合理地推测,独立董事及其所在的董事网络在开发支出资本化会计政策隐性选择中可以起到信息传递的作用。

最后,在现有的相关研究中我们发现,有关国外董事的社会网络关系文献并不区分独立董事和内部董事,其原因可能是在美国等成熟资本主义国家,独立董事制度经过不断发展,相对比较成熟,独立董事能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从我国的董事会制度变迁中可以看出,独立董事一开始就是被作为公司治理的装饰品而引入的(谢德仁, 2004)。李维安等(2010)在综述国外的研究中提到,在外部董事比例较高的董事会中,管理者的绩效会更高,这主要得益于董事们之间有更多的信息共享。我们考察中国董事网络时发现,在连锁董事中,中国独立董事的比例较高,2010年连锁董事中的独立董事比例超过了70%,从而独立董事作为董事网络中“桥”的作用突出,占据了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在获取和发挥异质性资源作用中起了主导作用。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要求,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1/3以上为独立董事。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一般不少于两名,无疑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越高,其话语权越强,独立董事的意见越能够被董事会接纳。具体到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决策,如果有多名董事在其他选择过开发支出资本化会计政策的公司任过职,那么他们经由董事网络传递的其他公司的信息更能够得到董事会的重视,其他公司先行采取开发支出资本化会计政策的示范效应也会更加明显。谢德仁和陈运森(2012)、Larcker et al. (2013)基于董事的兼任关系定义了董事网络,包括直接联结关系,即连锁董事,和间接联结关系,即基于连锁董事的联结而使不同公司董事之间联结的路径变短,进而有利于董事网络之间信息和知识的沟通及传递。对于那些不存在连锁董事(直接董事联结关系)的公司,若所聘任的独立董事在整个董事网络中处于核心位置,那么可以通过更短的路径来接触到基于非公共信息的会计政策(如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隐性选择)的信息,这种信息的获取也更准确和精确,从而能提高独立董事所任职公司也选择此类会计政策的可能性。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三个一脉相承的研究假设:

**假设 1** 对于首次采取开发支出资本化会计政策隐性选择的公司,若其独立董事同时在其他选择过开发支出资本化会计政策的公司任过职(独立董事或内部董事),则该公司在当年有更大的可能性也选择同样的开发支出资本化会计政策。

**假设 2** 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在其他选择开发支出资本化会计政策的公司兼任董事(内部董事或独立董事)的频次(人数或次数)越多,假设 1 所定义的连锁董事对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的传递效应越明显。

**假设 3**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网络中的网络中心程度越高,该公司越有可能选择开发支出资本化会计政策。

### 三、样本选择和研究设计

#### (一)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由于我国从 2007 年才开始在新准则中将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区分为研究阶段支出与开发阶段支出,并开始允许企业将满足五个条件的开发支出予以资本化。因此,为了研究上市公司开发支出会计政策的隐性选择,我们取 2007—2012 年剔除金融、保险企业之外的所有沪深两地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我国上市公司首次可以运用开发支出资本化会计政策的年份为 2007 年,至 2012 年,共有 6 年的样本。为了研究连锁董事对企业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我们将前两年定义为会计政策的“学习年”,后四年定义为会计政策的“运用年”。因为,一方面,新准则对开发支出会计政策的规定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以前的会计准则不允许开发支出资本化,要求所有的研发支出都要进行费用化处理,加之允许资本化的五个条件不是那么一目了然,企业对于新准则在这方面的规定有一个理解和学习的过程;另一方面,从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2007 年和 2008 年实行开发支出资本化的企业分别有 138 家和 183 家,只占到当年整体上市公司的 9.1% 和 11.6%。从 2009 年开始,实行开发支出资本化的公司逐年增加,2009 年为 239 家,2012 年增加到 451 家,分别占当年上市公司总数的 13.9% 和 18.9%。这说明在新政策出台之初,企业确实有一个观望和学习的过程。由于我们想研究在会计政策的“运用年”新增的开发支出资本化的公司,所以我们在 2009—2012 年的样本中,剔除了前两年已经采取开发支出资本化的公司。

对于公司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的数据,我们均是从上市公司年报中手工收集整理得到的。其他财务数据均来自万得(Wind)、国泰安(CSMAR)金融数据库。本文所有数据的整理、计算和回归过程所使用的软件为 SAS V9.2 和 STATA 13。为了避免极值的影响,我们对每个连续变量 1% 前和 99% 后的观测值进行了 Winsorize 处理。

## (二) 研究设计

对于有开发活动的企业,其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无非是三种情况——完全费用化、完全资本化或部分费用化部分资本化。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按照谢德仁和刘永涛(2013)的定义方法,将部分资本化(亦即部分费用化)的观测值也归到利用了开发支出资本化政策这一类观测值中。即本文的因变量为表示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隐性选择的虚拟变量,只要“开发支出”账户  $t$  年末余额大于零或虽然该账户年末余额为零但  $t$  年“开发支出”账户转入无形资产的金额大于零,我们就将上市公司界定为选择了开发支出资本化的会计政策,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为了检验假设 1 至假设 3,我们建立如下 Logistic 回归模型:

$$\begin{aligned} \text{Cap}_i = & \beta_1 + \beta_1 \text{Network}_i + \beta_2 \text{Size}_i + \beta_3 \text{Lev}_i + \beta_4 \text{ROE}_i + \beta_5 \text{Pis}_i + \beta_6 \text{Fshr}_i \\ & + \beta_7 \text{Mshr}_i + \beta_8 \text{Trdshr}_i + \beta_9 \text{Shrhfd10}_i + \beta_{10} \text{Issue}_i + \beta_{11} \text{Loss}_i \\ & + \beta_{12} \text{HighTech}_i + \beta_{13} \text{Chair\_C}_i + \beta_{14} \text{Big10}_i + \beta_{15} \text{RD}_i + \varepsilon_i \end{aligned} \quad (1)$$

自变量中,对于董事连锁网络指标 Network,我们用直接的连锁董事虚拟变量(D\_Link)、连锁董事频次(Freq)和独立董事在整体董事网络中的网络中心度(Score\_Median)三个指标来表征。其中,连锁董事虚拟变量(D\_Link)是表征连锁董事信息传递的虚拟变量,如果在会计政策的“学习年”(2007 年和 2008 年),公司  $i$  的独立董事中有在其他公司任职(内部董事或独立董事),且他兼任的公司在“学习年”采用了开发支出资本化的会计政策,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连锁董事频次(Freq)表示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在开发支出资本化政策的“学习年”兼任的人数或次数,即如果上市公司在 2007 年或 2008 年有  $n$  个独立董事在其他进行过开发支出资本化的公司兼职,则连锁董事频次(Freq)取值为  $n$ ;同时,我们也将同一个独立董事在不同年份的兼职情况也计算在内,即如果上市公司的  $n$  个独立董事,不但全部在其他实行过开发支出资本化的公司兼职,而且其兼职的公司在 2007 和 2008 年两个年度都选择了开发支出资本化的会计政策,则连锁董事频次(Freq)的取值为  $2n$ 。独立董事网络中的网络中心度(Score\_Median)为计算独立董事个体层面的四个网络中心度具体指标(程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介中心度、